

篇名

戲說文字 - 漢字起源

作者

曾莉。私立曉明女中。一年戊班

## 壹、前言

文字已成為我們生活的一環，而它究竟是在何時、何地，又是由誰所創造的呢？傳說中的結繩記事、河圖洛書、倉頡造字，到底其是否可信，為什麼會有這些說法？而迄今考古發現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在商朝，甲骨占卜與軍事戰爭一樣，同屬於國家大事，這樣的習俗起源於何時？但亦有人說陶文才是最早的文字，為何會出現這種說法？他的依據是什麼？依照年代的劃分，古書史籍的記錄，和考古研究的發現，探討其起源，並追究其發展的前因後果，一探文字的神秘面紗。

## 貳、正文

### 一、傳說

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進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偽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迹之跡，之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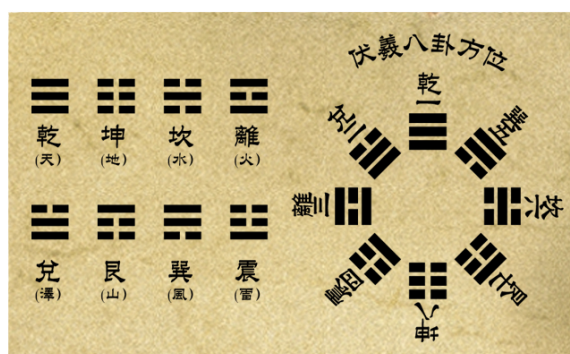
#### 01. 結繩

《北史·魏本紀》說：北朝魏的先世「射獵為業，淳樸為俗，簡易為化；不為文字，刻木結繩而已。」記錄了原始社會部落或中國一些少數民族，在文字出現之前，以結繩記事的方法，把戰爭、獵獲、會盟、選舉、慶典、聯姻、生育、疾病和災害等大大小小的事件記錄下來。過去亦有學者據《周易·繫辭下》「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的論說，推斷「文字起源於結繩」。

#### 02. 畫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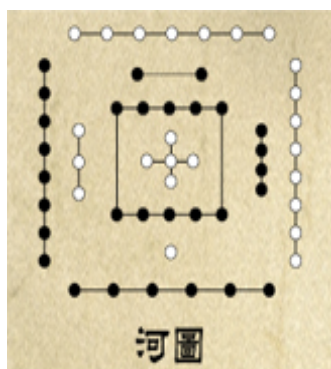
孔安國《尚書》序（屬偽作，但年代甚古）裡說：「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易緯·乾·鑿度》認為：乾卦，天字的古文；坤卦，



地字的古文；離卦，火字的古文；坎卦，水字的古文；巽卦，風字的古文；震卦，雷字的古文；艮卦，山字的古文；兌卦，澤字的古文。

### 03. 河圖、洛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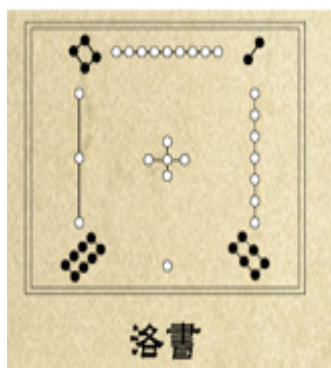


《易·繫辭上》：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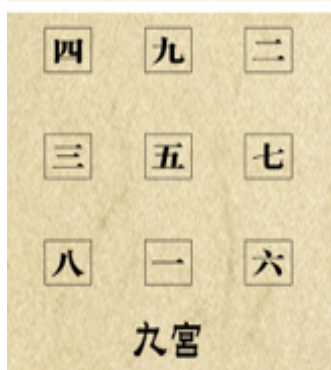
《河圖·玉版》：倉頡為帝，南巡狩，發陽虛之山，臨於元扈洛汭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之。

「圖」、「書」出自河洛，其事何其神祕！神祕主義正是此說的一大特點。

虛而言之，可以理解為圖畫與書錄，實而言之，可以理解為《易經》與《尚書》。



《辭海》「河圖洛書」條下說：傳說伏羲氏時，有龍馬從黃河出現，背負「河圖」；有神龜從洛水出現，背負「洛書」。伏羲根據這種「圖」、「書」畫成八卦，就是後來《周易》的來源。一說禹治洪水時，上帝賜給他以《洪範九疇》（《尚書·洪範》），劉歆認為《洪範》即洛書。



揭開此說的神祕面紗，不難發現，它真實的核心就是算數，能對照「九宮」演算法。所謂「九宮」，在讖緯家來說，是八卦加上中央，合為九（「五」位於中央，還可以和五行聯繫起來）；在術數家眼中，則其數橫、豎、斜偏、相加得數恆為 15。

### 04. 倉頡作書

「倉頡造字說」在戰國時即已流行。《呂氏春秋·君守》說：「倉頡作書，后稷作稼。」《荀子》、《韓非子》也有記載。《淮南子·修務訓》高誘注說：倉頡「生而見鳥跡，知著書」。到了秦漢時代，這種傳說更加盛行。許慎《說文解字·敘》：「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

倉頡到底是什麼人呢？傳說他是黃帝的史官，黃帝是古代中原部落聯盟的領袖，由於社會進入較大規模的部落聯盟階段，聯盟之間外交事務日益頻繁，故迫切需要建立一套各盟聯共用的交際符號，於是搜集及整理

共用文字的工作便交在史官倉頡的手上了。

宋代淳化年間，有一部著名的書法集子叫《淳化閣帖》，其卷五載有古篆書二十八字，傳說是倉頡所寫。(註一)

## 二、陶文

古人在陶器上刻畫的文字符號，較有名的如賈湖刻符、半坡陶符、丁公陶文、高郵陶文等，另有學者指出陶文可能比甲骨文更早而成爲中國最早的文字。(註二)近代學者對於陶文的發生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說是始自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遺址(公元前 4770±135 年)的 22 種刻畫符號，一說是出於山東大汶口文化(公元前 2780 ±145 年)陶器上的三種圖形。事實上，上述兩宗材料只是刻在陶器上的符號，或具有辨識的功能，但並不算是代表記錄語言的文字。真正確定是屬於陶文的，最早要推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中的陶器刻畫。

### 01、類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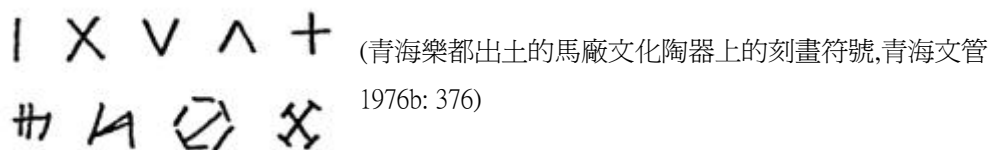
#### A. 西安半坡

在好些個仰韶文化的遺址，都發現刻劃各種不同記號的陶器。根據碳十四年代測定，這些遺址的年代距今已有六千多年以上。它與某些人根據甲骨文的成熟度，推測所得的中國文字的萌芽年代相若。故有不少人相信，那些陶器上簡單而似文字的刻劃就是中國初期的文字。這些記號幾乎都刻在相同的部位，即在早期類型的直口鉢的外口緣上。充分說明它們不是任意的刻劃，而是具有某種作用的。發現於陝西中、西部仰韶文化遺址的記號如右圖所示。



(仰韶文化彩陶上刻畫符號，西安半坡:197)

見於甘肅、青海一帶，承繼仰韶文化的半山、馬廠等文化的記號如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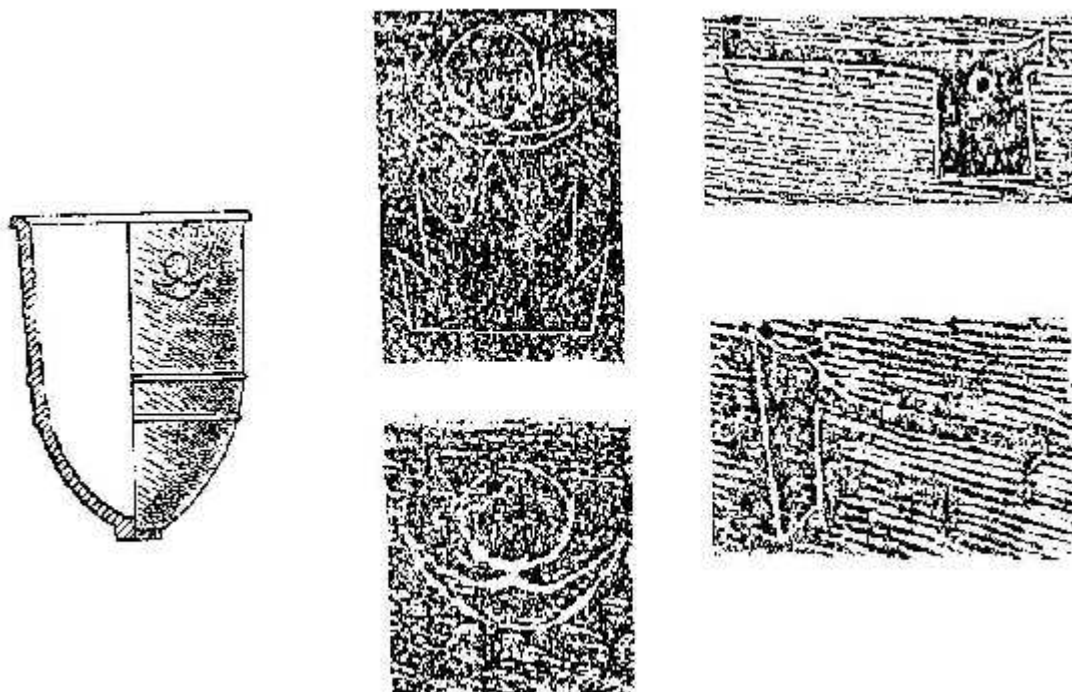


(青海樂都出土的馬廠文化陶器上的刻畫符號,青海文管 1976b: 376)

以上所說的記號，有的在好幾件陶器上出現。在同一窖穴或地區，也往往見到相同的記號。或以爲它們是器物所有者，或製造者的花押、族徽一類的記號(西安半坡: 198)。有些記號與後世的數位或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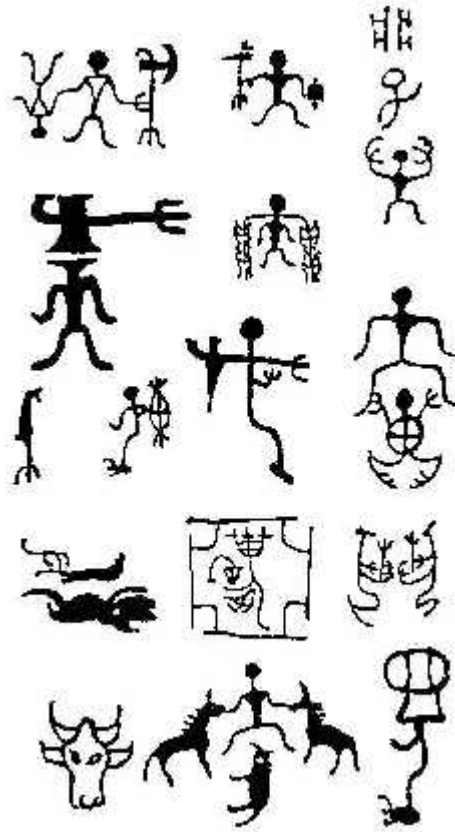
位字相似，故有以爲它們是燒製陶器的序列或方位的記號（註三）。又由於它們發現於不同地區與不同時代的遺址，有人不但認爲它們已具有文字的作用，也相信中國文字的起源是單元的，即是從仰紹文化發展起來的。

## B. 山東大汶口文化



(山東莒縣的花廳期陶氣上的刻畫符號)

它們與仰紹文化的刻劃一樣，被單獨地刻在大口缸外壁靠近口沿的部位，非常顯眼的位置。其中一形見於相距七十公里的遺址。它們不但很可能就是物主的名子，也與甲骨文、金文的字形有一脈相承的關係，都具有圖畫的性質。在一些商末周初的銅器上，往往鑄有比甲骨文字形看起來更爲原始、更接近圖像的族徽。學者一般相信，這些族徽保存了比日常使用的文字更爲古老的字形傳統。這種非常接近圖像的性格正是大汶口晚期陶文的特點。



(商周青銅器銘文中圖形系統的族徽,郭沫若 1972 a:13,左圖)

### C. 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

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陶器刻畫共有二十四個。這些刻畫符號整體而言和殷墟甲骨文有別，但其中已有具備獨體象形的條件，如：□、□、□、□、□、□等。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同時出現的□、□兩個箭狀符號，前者圖畫味道濃厚，後者則純作線條化。這種繁省共出的現象，對比殷代甲金文中象形的象字作□，又作□，虎字作□，又作□等繁簡互見的例子，二里頭的符號似乎是有構成文字的可能性。此外，最重要的證據是遺址中同時出現的：□、□、□、□、□、□幾個線條符號。其中的前四個屬於順序遞增的豎畫。這種順序的刻畫見於同坑是歷來考古出土陶器中所僅見的。它們很明顯的在用法上具有相互的關連意義。單一豎畫固然可以代表任何具體東西的抽象化記號，但是一系列順序的豎刻畫在同時出土的陶器中的固定位置上時，我們有理由相信它們應該是有意識的刻畫，亦即具備積畫的數數功能。它們之間的關係，含有區別諸陶器間鑄造或使用上先後次序的實用詞義。如此，這些線條符號的出現，當然是用作記錄數目的文字，即相當於六書中表達抽象概念的指事字：一、二、三、四。另外，□可能是五字，□可能是八字，這和甲骨文中的五、八字形作□、□的寫法是相合的。由於這一組指事字群的同時同地出現，再對比漢字的發生理論上是先有實象圖形，復由實象造字過渡到虛象造字的一個前提，這反映出二里頭遺址的夏文化應該已是一個掌握文字運用的時期。

二里頭陶器中除了兼具有象形、指事的字例外，復具有由兩個結體併合的符號，如：□、□、□。後二例中研院史語所的李孝定先生曾釋為俎，為死，但不見得可靠。兩個獨體字併合的結果，可借此以表達獨體之間的關係或動作，從而轉生會意的功能，亦以此提供作為抽象名詞或動詞詞性用法的可能性。

由以上這些線索，推論代表夏代時期的二里頭陶器上的刻符確是表達語言的文字。而且這個時期應該已經脫離文字草創時期單純的圖繪狀態，在用法上可能已兼具六書中的象形、指事、會意三種方法。就目前的出土資料，我們談中國文字的起源，宜自四千年前河南偃師二里頭的陶文開始。(註四)  
(內文「□」部分為甲骨文字，基於對作者作品的尊重，謹以符號代替。)

## 02、陶文記表（註五）

### a. 年代記表

仰韶文化陶文----陝西西安半坡，寶雞北首嶺，臨潼姜寨、零口、垣頭，銅川李家溝…….公元前 5000 左右

龍山文化----河南登封王城崗、臨汝煤山…….公元前 2000-3000 左右

大汶口文化----山東莒縣陵陽河、諸城前寨、大朱村…….公元前 2000-2500 左右

良渚文化----杭州良渚、上海松澤、馬橋、…….公元前 2500-3500 左右

馬家窯文化----青海樂都柳灣……. 公元前 2000-2500 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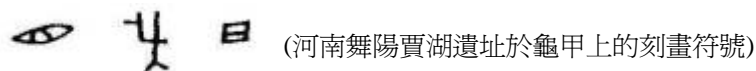
二里頭文化----河南偃師二里頭……. 公元前 1500-2000 左右

商代中期文化----鄭州二里岡、南關外、江西清江吳城、河北檣城台西……. 公元前 1600 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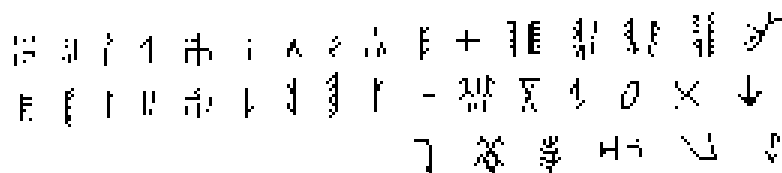
殷墟文化----安陽小屯……. 公元前 1200 左右

### b. 考古記表

河南舞陽賈湖一個有七千八百年之久的遺址，龜殼上刻劃如下圖的符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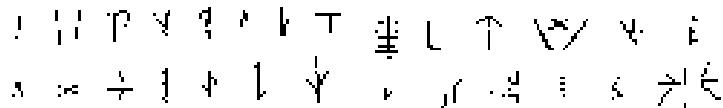


1954 年在西安半坡遺址出土的陶器和陶片上，刻有幾何形符號計 27 種，如下圖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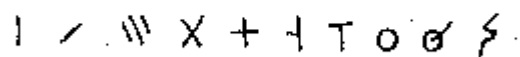
(《西安半坡》第 197 頁，圖 141，文物出版社，1963 年。)

半坡類型的這種陶符，還在陝西寶雞北首嶺、長安五樓、合陽莘野、銅川李家溝和臨潼姜寨、零口、垣頭等仰韶文化遺址中發現，其中以姜寨遺址發現最多，計有 38 種，如下圖所示：



(王志俊《關中地區仰韶文化刻劃符號綜述》)

略晚於仰韶文化的馬家窯文化，早在 30 年代就在甘肅的和政半山和青海的民和馬廠沿兩地出土的陶壺和陶罐上，發現有用顏料描繪的符號，曾收集有 10 種，如下圖



(巴爾姆格倫《半山及馬廠隨葬陶器》，《中國古生物誌》第 3 號第 1 冊，1934 年。)

1974 年在青海樂都柳灣馬家窯文化的墓地裡，發現在隨葬陶壺的腹部或底部有塗畫的符號，每件器物畫一個，共 50 種符號，如下圖。



(青海省文物管理處考古隊《青海樂都柳灣原始社會墓地反映的主要問題》，《考古》1970 年第 6 期)

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刻繪符號在龍山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遺址中也有發現。

1928 年，在山東章丘龍山鎮城子崖龍山文化遺址中出土三片刻有符號的陶片，計有兩種符號，如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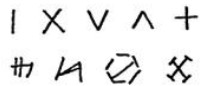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坡子崖》圖版 16，1934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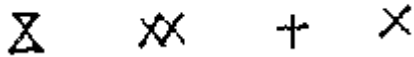
1964 年秋，在青島北郊白沙河南岸趙村的龍山文化遺址，採集到一些陶片，其中有一片帶有刻劃符號。

另在河北永年縣台口村的龍山文化遺址中出土的一件陶罐上，也有一刻劃符號，如下圖所示。



(河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隊《河北永年縣台口村遺址發掘簡報》，載《考古》1962 年第 12 期。)

1960 年至 1961 年，相繼在上海馬橋、青浦崧澤兩處發現的崧澤文化遺址中，上海馬橋出土陶符 4 種，如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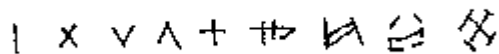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上海馬橋遺址第 1、2 次發掘》，載《考古學報》1978 年第 1 期。)

青浦崧澤出土陶符 4 種，如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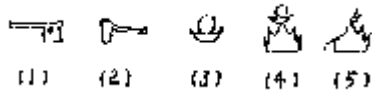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上海市青浦縣崧澤遺址的試掘》，載《考古學報》1962 年第 2 期。)

1936 年在浙江餘杭良渚鎮的良渚文化遺址中出土的陶器上，計有 9 種刻劃符號，如下圖。



(施昕更《良渚》，西湖博物館，1938 年。)

在距今約 4500 年，早於龍山文化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遺址裡，出土的象形符號，更引起人們的注意。據已發表的材料，在山東莒縣陵陽河遺址發現了 4 個。



(見山東省文物管理處等《大汶口》第 117—118，文物出版社 1974 年。又《文物》1974 年第 1 期第 75 頁。)

## 參、結論

遠古人們結繩記事，但其並沒有與有聲語言直接的連繫，《周易·繫辭下》中是針對文字與結繩「此起彼伏」的演變過程，結繩的出現是爲了幫助記憶，並不能說是文字的起源。河圖洛書則是把圖畫與書錄結合，雖然與文字起源無關，但其牽涉到文字起源於圖畫這個概念，因而有此一說。倉頡造字的說法並不可信，文字是人們長期摸索，約定俗成並且逐漸完善而形成，絕非以一人之力所及的，但其可能在漢字的發展中，進行過收集以及整理的工作、推廣使用。以考古而言，文字起源追朔至商、夏、甚至新石器時代的甲骨文和陶文，陶文可說是文字的雛形，甲骨文則是成熟的文字。值得關注的是：陶符年代屬大汶口文化晚期，約當 4,800 年前，而大汶口文化晚期象形陶符的狀態及性質，與商代青銅器銘文初興階段單個族徽類似。大汶口文化陶符和古漢字亦顯現出息息相關、一脈相傳的特質。

## 肆、引註資料

註一、中國文化研究院 <http://www.chiculture.net/>

註二、大紀元時報 <http://tw.epochtimes.com/>

註三、《甲骨文字集釋》p.368 李孝定著。1974

註四、談中國文字的起源 朱歧祥著。傳統中國文學電子報第一零七期  
2002/1/18

註五、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6%AD%E5%9F%BA%E7%99%BE%E7%A7%>